



【公共管理研究】

中苏石油合作与中西话语之辩

韩晓东^{1 2}

(1.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2. 陕西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系,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从话语逻辑分析入手,对于由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关系发展所引致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国际话语权博弈问题作学理性探讨。指出,在现行国际话语权定义中应当引入非利益原则,并使之与国家利益原则趋向平衡;在中西话语之辩中的西方国家话语逻辑依然凸显利益本位;中国和苏丹等发展中国家国际话语权建构亟需创新。

关键词:中苏石油合作;中西话语权;解读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6-0142-06

一、立论基本前提

(一)现实背景

国际话语权(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s)问题是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兴起的一大热点话题。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热力推进,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发世界各国间交流、沟通、互动的频率与节奏剧增;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格局的重组,极其需要赋以新的概念解说;主要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和翘首企盼美好愿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均渴求能够在长期由欧美发达国家操控的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大的声音,讲出更多的想法,提升自身的形象;同样,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发达国家及其集团为继续维护已有强势地位,也在刻意地更新观点储备,调整表达策略。也就是说,世界的巨变引发国际话语权问题的升温。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国家苏丹之间在石油资源开发及其贸易方面密切合作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由于达尔富尔问题等诸多复杂因素推动,最终被毫无悬念地摆上了国际话语激烈博弈(主要是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平台。

(二)理论诉求

按照现行国际政治学一般定义,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社会发展事务和国际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这些事务与国际环境密切相连,并体现了知情、表达和参与权利的综合运用。简单地说,国际话语权就是对国际事务和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1](P 110)}但是,该定义应当和极有必要重视非利益原则的价值,方能更臻完善。现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部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在国家间关系中本应存有的伦理人道原则等多方原则在事实上严重式微,盛行于世的利益原则反而很容易从正面论证、支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的合理性。非利益原则和利益原则间相互沟通、制衡的有效机制远未形成。在当前对国际话语权的激烈争夺中,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话语交往中,针对后者而发的非利益原则语词被普遍空心化、利益化。所以,研究国际话语权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国际话语权概念本身的逻辑基础、立论依据和学科源头,不应简单照搬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现行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本文特提出并按照话语机制、话语逻

收稿日期:2010-05-20 修回日期:2010-0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SS011)

作者简介:韩晓东,男,河北沧州人,陕西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从事国际政治和能源外交研究。

辑和话语数量三位一体表达结构,以话语逻辑分析为立论基础,针对中苏石油合作关系引发的国际话语权问题做有分寸解读。

二、话语逻辑相关分析

(一)现实逻辑起点

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性事件。它不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在另一个经济落后国家领土上与之合作开发油气资源的常规经济事件,而是在世纪之交,由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亚洲大国与另一个严重欠发展的非洲大国,抵御各种不利条件和复杂压力,经过双方精诚合作,在有限时期内帮助后者建立起完整本土化石油工业体系,进而全面带动地区社会发展,充分实践人道主义原则和南南合作精神的成功范例,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经济事件。中苏石油合作关系开端于1990年代中期,但是两国之间的传统关系早已源远流长,石油合作关系则是对这一关系的强力推动和深化。目前,中苏石油合作正进入成熟期,其影响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间正在快速扩展、加深,对于中国自身的影响自然也是丰富的和多方面的。紧随着苏丹近24年来第一次多党大选于2010年四五月间顺利举行,这个曾长期被南北内战和达尔富尔问题困扰的非洲大国的历史正翻开新篇章,该国各方面发展前景被世界普遍看好。已稳定推进十余年的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关系将继续前行。围绕这一关系所发生的中西话语权纠葛和话语逻辑纷争也将因此而延续。

(二)主要逻辑辩点

1 “中国责任论”与“尊重主权论”之辩

达尔富尔危机的爆发,通过一些西方国家的组织机构、公共传媒、政客有意无意的非理性联想,再辅以体制性炒作,“顺理成章”地把这一危机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国。他们的直接逻辑是,中国帮助苏丹发展石油工业,使苏丹政府获得充足的石油资本以支持对达尔富尔黑人实施“种族屠杀(genocide)”,因而中国政府有责任履行人道主义义务,阻止苏丹政府的“恶行”,要么向后者直接施加政治压力,要么将中国石油公司业务撤出苏丹,否则,中国就是苏丹政府的帮凶。该论调人为地把中苏之间原本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纯经济往来,解读为政治、军事同盟性质的关系。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乔迪·威廉姆斯即是持该观点逻辑的代表人物之一。^[2]

我们得承认,中国的国家利益的确日益具有全球化特征。达尔富尔问题虽然并非起因于中国,但它确实已经关联到中国与非洲及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与处置,考验着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在其成长过程中处理复杂国际事务的能力,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如同在以巴领土争端、朝鲜核问题等重大问题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一样。^{[3] (P20-21)}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充分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其内政,不介入其内部冲突,不偏袒冲突中任何一方;以朋友的身份和平等善意的方式,向苏丹国内各方建言忠告;在联合国框架、非盟框架和中苏关系框架内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谋求问题的妥善解决;同时,积极派兵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提供大额度资金、物资援助,成规模地参与当地民生设施的恢复、重建和新建等。

应当说,中国的相关作为是有目共睹,可敬可嘉的。反之,在话语逻辑方面,西方国家的反应十分复杂,有人依然刻意要求中国终止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关系。有学者指出,其中隐含了太多不方便表达出来的利益动机,主要还是想假以非利益原则迫使中国承担力所不及的责任,达到既离间中苏关系、控制苏丹石油资源,又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化双重目标。^[4]

2 “中国殖民论”与“共同发展论”之辩 中国石油企业受邀带资赴苏丹参与作业,开启了双方石油合作关系新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石油供应趋紧,达尔富尔危机“适时”发生,西方国家话语机制应时而起,立时将中苏石油合作关系问题作为论战焦点而百般挞伐,非理性话语甚嚣尘上。其中伦理意味最浓的是“中国责任论”,而经济意味和学术意味较浓的则是“中国殖民论”。其实际缘由之一是,西方殖民时代早已结束,中国在非洲(包括苏丹)影响力的上升使得一些西方人士抚今思昔,心理失衡,便重拾废弃已久的“殖民”话语加诸中国;其实际缘由之二是,以“殖民”话语贬损中国,打压中国和中国公司形象,还可为西方国家及公司日后可能在苏丹恢复扩大影响力做足铺垫。此也所谓针对中国的“新殖民论”。然而,该论并没能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主要体现的还是心理联想原理和政治、经济利益原则。

首先,在中苏石油合作关系内在框架和外部机制中,根本不存在符合“殖民”话语定义的不平等政

治关系结构,如宗主国与殖民地间关系等。其次,中国在与苏丹的石油合作中始终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干涉苏丹本国的政治、司法、外交事务。再次,中国不寻求控制苏丹经济,苏丹国内也不存在畸形殖民地经济体系,更不存在掠夺性开发,经济结构日趋平衡;^[5]在石油合作项目运营中彼此保持平等沟通,公平贸易,涉及了控股参股、设施移交、培养当地人才等方面,而从不企图长期占据任何优势资源和机会。^[6]此外,两国之间存在着正常人员往来,完全不存在来自中国的大批移民定居之特权人口阶层。还有,中苏双方在开展石油合作过程中始终重视基础设施(市政、道路、供电、供水、医疗卫生、教育等设施)、环境保护设施等民生类项目建设,并坚持保本微利、注重长远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立项原则,等等。这是在以往殖民地时期及西方石油公司在苏开发时期所未做到的。^[7]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在非洲有没有殖民主义时,埃及外长盖特十分肯定地答道:“在非洲完全没有中国的殖民主义,……甚至在未来的500年中,我们都会保持这种和平、友好的关系,而绝不是殖民主义的关系。”^[8]

3 “中国威胁论”与“构建和谐论”之辩

“中国威胁论”最初起源于1990年代西方部分政界、学界、传媒界人士因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防力量有所加强的事实,同样产生严重心理不适应,进而提出的主要论调之一。在中苏石油合作关系问题上,该论调也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其基本逻辑为:中国强化与非洲关系,中国公司开进苏丹,中苏石油合作取得成功,本身就印证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中国能源供应的改善,从而加大了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威胁,所以非常有必要借助诸如达尔富尔事件、人权等问题阻止或遏制中苏石油合作关系的发展。可能的方式一般有:对苏丹直接实施政治、经济、军事制裁,以压促变;援助苏丹反对派;肢解苏丹等,最终迫使中苏石油合作半途而废,中国公司被迫撤离,西方石油巨头重新掌控苏丹石油工业命脉。^{[9][10]}“中国威胁论”话语逻辑中渗透着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和强烈政治短见。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坚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自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塑造爱好和平、谋求发展、推动南南合作的国家形象。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新的国际环境,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内政理念和“构建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充分

完善、深化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德治”“仁政”政治学说,“宽忍”“克己”“崇礼”伦理操守和悠久的文明自豪感;近代以来遭受列强欺凌的经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中国仍将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事实及60多年来外交活动实践等,共同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心理和现实基础。有必要和应当承认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较所具有的独特性和牢固性,充分尊重其话语逻辑的深刻合理性。中国的复兴、中国与苏丹等第三世界国家在各方面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正是为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而非对世界、对西方的重大威胁,从而有力破除了所谓“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世界权力转移论”描绘的中国将会在实力崛起过程中必然与西方国家发生碰撞的虚幻图景。^[11]

三、针对中西话语权问题的深层解读

(一) 以西方发达国家话语模式做相关解读

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相对稳定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多元话语表达主体虽倚靠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参用相似的思维方式和工具,但每一主体自身在生活感受和思想感悟的积累方面相互呈现极度多样化的差异,对同一个问题必定非常自然地给出蕴涵极度多样化差异的话语表达。此所谓当代西方社会体制中“言论自由”保障机制的内在理性依据。这样的机制凭借“差异即合理”理念承认了每一社会主体均享有彼此均等的表达自己所相信的差异性观点的权利,所以每一主体的观点并不一定要为其他主体的观点直接负责,不同观点间只具有辩论、沟通、谅解或在特定条件下实现整合的关系。批评某一主体并不等于有意支持其反对方,即使在客观上有利于其反对方。在公开场合中针对各类对象、问题的批评活动是西方整个社会体制运行的常态现象。舆论导向和话语控制功能并非直接源于政府行政权力,而间接来自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同源性和社会体制的灵活性。我们很难就其中某个观点(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而抨击其整个社会,恰因为观点表达的多元性,纵然存在着一定的主流观点,并没有哪一个观点能真正完全地代表整个社会,整个社会自己才能代表之。在社会氛围中若不出现批评性意见反而会成为病态。迄今,这一机制已经扩展到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掌握着绝大部分话语通道和话语数量。于是,在多话语主体群共同作

用下,由其他国家、地区主体发出的抨击声在这里会很容易地被溶解掉。当然,这样的机制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多话语主体间客观存在着相互竞争以迎合公众感性的潜规则,对问题的揭示往往趋于简单、高调和肤浅,理性与真相原则经常受其冲击。如大量的话语概念主要经由社会组织、政府咨询机构、媒体、议员等非决策层面提出,语气、方法通常激烈有余而缺乏思考。不过,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部分学者出于执政过程的现实考虑和学术规范的要求,一般还比较善于调控与庞杂舆论间的距离,择其要而用之,适度平衡与国内各方势力及与他国的关系并能够作出有分寸的话语表述,始终留有充裕的进退余地。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贝德就认为,中国加大了为结束达尔富尔危机的外交努力,并在2007年取得了积极成果,美国政府不应盲目跟风一些个人、媒体、组织的抵制北京奥运宣传。^{[12][13]}2008年8月美国时任总统布什也最终按约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因此,在中苏石油合作关系问题上,中国、苏丹等国完全可以冷静地审时度势,适应其话语机制的多元性和相对包容性特点,既避免反应过激,态度僵硬,又须正面地表明自己的理念、立场和观点,展示和完善自身话语逻辑。回避问题只能增加彼此间不信任感,促使问题复杂化,促使话语逻辑更趋僵化。

(二)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话语模式做相关解读

另一方面,在被动适应现实变化和耐心探索市场化、全球化内在本质的过程中,为妥善面对早已遍行世界的西方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和强势话语权,中国、苏丹等经历过漫长曲折独立斗争期和发展困惑期的亚非后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一词专指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在目前正显现出较大发展潜力并且其社会经济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的国家主体),则不得不推行和强化另外一种类型的以集中资源、突出重点、加速发展、独立自主、恢复或谋求应得国际地位,从而能有效参与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基本施政方略的国家管理体制模式。该体制模式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特征,其结构关键点是集中性、加速性和独立性三者统一。它在中国、苏丹等国发展独立经济体系和建设独立国际话语权方面都曾发挥出极大作用。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本国内部政治力量和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统一治理及重点领域加速推进,并维护好与同类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就有可能在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许多问题上,切实增

加自身的话语权重。二战后的60余年间,民族独立原则、国家统一原则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直在共同构造着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权利所需的有效话语逻辑系统。同时,这些逻辑系统也不断经受残酷的考验,特别是来自前苏联集团和西方国家集团的利用、曲解和践踏。如在冷战时期,前苏联集团主要打着“国际主义”旗号干涉他国内政,以抵消民族独立原则;用主权有限论为侵占他国领土行径辩护,以抵消国家统一原则等。西方国家则主要以“自由论”“人权论”“民主论”等论点支持自己的类似行为。冷战结束以后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反恐论”被大幅升级,^[14]单边主义抬头,“人权论”得到充分强化,辅以喧嚣不止的“中国威胁论”和“邪恶轴心论”等话语逻辑,严重挤压包括中国、苏丹等国在内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使得诸如中苏石油合作这样的常规经济关系也不能逃脱西方国家话语逻辑的追杀。至今在全球范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占有着针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话语优势。究其内因之一,乃在于中国等国与西方国家交往远不够深入,自身话语逻辑单薄,话语创新明显不足。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70年代末开始,中国对西方政策中的沟通性特征逐步鲜明起来,处理任何国际问题总以话语协商为先。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还经常主动参与调停其他国家或国家间的军事、政治、领土纷争,如以巴领土争端、朝鲜核问题等。每当发生大的国际、国内事件,甚至每当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关系陷入不稳定,彼此也会随时通过国家间关系框架、领导人热线或其他政府间话语渠道通报情况、讨论事态、协调立场。

然而,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文明模式和力量对比态势,彼此间的关系实际面临异常严峻的话语逻辑纠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2009年11月18日《联合早报》发文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逐步发展起与美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相互依赖型关系。随着两国之间互动的强化,它们的行为、思维和话语逻辑难免出现一定的趋同性。但是中国文明和美国文明具有不同的心理素质、实践能力、地缘政治与战略,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中国确立能够反映自身特定本质的话语逻辑规范。如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包括苏丹)进行资源(特别是石油)外交的过程中,努力发展出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关系。西方则用自己的话语如“新

殖民主义”等,来诋毁中国在当地的政策,尽管中国从未那样做过。文章指出,中国崛起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必须努力避免过多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亟需确立能够解释自己国际行为和表达中国文明特征的话语逻辑系统。^[15]否则,中国更易于因丧失对众多(尤其与西方国家密切相关的)问题的定义解释权而在国际关系格局中陷于不利。

我们经常提及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之分(话语权被归入软实力),^[16]或“实力”与“话语权”之分,均显相对笼统,因对其中内在关系的表述相对单一。如认为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强弱决定它的软实力的强弱;换句话说,实力决定话语权等等。本文认为,其中内在关系绝不应是单一性的关系,既存在一定的正比关系(如上述决定论),也存在互补或反比关系。如在多元化、多样性、多主体的当代国际关系格局中,人道原则、法律原则、机会原则都会对单一的利益原则和实力原则形成制约力,即便超级大国所信奉的单边主义论调也自有其周期性和自相矛盾性,随时会面临调整的玄机。另外还存在大量内容丰富的其他关系维度,如族群(民族、种族、部族)原则、宗教原则、历史文化原则、地缘环境原则、意识形态原则等等。以所有这些原则为前提,对话语所蕴涵的逻辑能力的开发程度、创新程度才决定了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所着力工作的真正价值,这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水平。^[17]

(三)以话语权原理做综合解读

在这里还需澄清一些要点。第一,话语本是人际沟通的工具和活动,表达、理解、认知、情感等过程贯穿其中。它可能会受到出于某些目的利用和操纵,但这不是它自己的问题。过分政治化的话语更容易引致怀疑而不是信任,过多地回避问题易导致话语权的丧失,过于浓重的渲染则易造成舆论迷乱。第二,就事而表达,就理而阐发,配合以机会、渠道和容量,并且形成内在的提问、论辩、思考循环流程,这是一定话语机制赖以存在的常规原理。第三,身处足够开放的话语机制结构中,某主体尽可以对抗某个观点,却很难对抗该话语机制本身。第四,话语逻辑的合理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话语逻辑的现实有效性则基于一定程度的话语预先布设,可分为观念知识布设、方法布设和习惯布设等。第五,数百年

来,源自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体制效应伴随西方经济、军事扩张向全球延伸,其话语机制、话语逻辑及其调整过程也一步步地被布设到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国家,至今已积累起相当庞大的话语数量库。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当前所谓的“国际舆论”主要是指西方话语主体的言论表达;“国际社会”则主要指西方政治强权体系。如,目前西方四大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80%;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量的90%以上是由西方国家垄断的;西方排名前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世界95%的传媒市场份额;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制作和生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等。又如,联合国维和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国际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机制中,中国都没有话语主导权;在讨论制定极地、外空和公海等全球公共产品规则时,中国代表几乎总被安排在会场后排座位,而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代表则坐在前排,^{[1](P111-112)}因为中国尚缺乏对诸多此类问题的关注、研究和深入理解,远未形成独立的话语逻辑和话语数量库而无法在国际现行的话语机制下拥有足够发言权。再如,中国援建物资若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遭小股武装分子抢劫,中方人员轻易不会请政府军去夺回,因担心被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为支持苏丹政府而激化当地冲突。^{[3](P182)}

有鉴于此,面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强权,中国、苏丹等第三世界国家不仅应当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应以已有发展成果为支撑,更加重视对自身国际话语权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学理性探讨与微观环节建设,在生存权、发展权和话语权之间实现相对平衡与内在统一。目前,对中苏石油合作关系作出更加合情、合理、合法的国际话语解读,实际存在着足够大的语用逻辑空间,只是急待中苏两国的官、民、学等各界以及其他国家的善意理性力量能够客观、高效、创造性地给出作品来。从操作层面来讲,中国、苏丹等国应进一步完善自身现有的话语机制,切实增大话语数量(媒体机构数量,渠道数量,信息数量),尽可能充分地保障自身话语逻辑能够为人知、为人解和为人敬。对现有的深受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话语环境应抱以冷静、积极的态度,既要认真研究、沟通、学习,又必需主动利用、合作、创新;而非简单地否定、回避或对抗。^[18]毕竟,所有这些现实存在体都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都应当被合

宜地开发、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台阶和动力源之一。

参考文献:

[1] 梁凯音. 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9 (3): 110

[2] WILLIAMS J, FARROW M. Sudan’ s Enablers Chinese oil companies fuel genocide in Darfur It’ s time for Americans to divest[J]. From the WSJ Opinion Archives 2007 (3).

[3] 刘鸿武, 李新烽. 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4] 哈拉德·舒曼. 有关恶龙的谎言 [N]. 每日镜报, 2008-04-16 (8).

[5] KURLANTZCK J. Beijing’ s Safari China Move into Afric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id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J].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11): 3

[6] 詹姆斯· 瑞特. 适得其反的奥运会抗议 [N]. 汪析, 译. 外交政策聚焦, 2008-05-13 (3).

[7] 杨宝荣. 中国与苏丹经济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J]. 当代世界, 2008 (5): 62-64

[8] 徐兆荣. 中非峰会: “ 和谐世界 ” 理念的成功实践 [EB / OL]. <http://www.focac.org/chn/zyzl/hywj/>.

[9] MEREDITH M. The State of Africa [M]. London: Free Press, 2006: 594

[10] 贺文萍.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 [J]. 西亚非洲, 2007 (11): 6-8

[11] 汤伟. 和谐中国国家形象: 原则与政策 [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2): 26

[12] 李学军.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作用获赞誉 [EB / 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9/27/content_6801372.htm/.

[13] 奥运政治化倾向不可助长 [N].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 2008-02-23 (1).

[14] MORSE D. Blood, Ink and Oil: the Case of Darfur in Common Dreams [EB / OL]. <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s05/0721-26.htm/>.

[15] 郑永年. 中国外交思维美国化的后果 [N].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11-18 (1).

[16] 塞缪尔·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88-89

[17] 石齐平. 中国高额顺差是损伤自己补贴美国 [EB / OL]. <http://www.ifeng.com/2010-08-13/>

[18] 新华通讯社. 媒体峰会展现中国开放姿态 [N]. 参考消息, 2009-10-10 (1).

[责任编辑 陈 萍]

Sino– Sudan Oil Coope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N Xiaodong^{1, 2}

(1.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partment,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iscourse logic analysis, a fundamental study is made on the gam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caused by Sino– Sudan oil cooperation. It argues that non– benefit principle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urrent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s, balanced with benefit ones; the Western discourse logic remains the same, putting undue stress on benefit principles; large numbers of innovations are urgently needed in the consummating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s of China, Sudan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Sino– Sudan oil cooperation; discourse rights of China and the West; interpretation